



光启
文库



随缘求索录

张绪山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随缘求索录

张绪山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随缘求索录 / 张绪山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
（光启文库）

ISBN 978 - 7 - 100 - 16888 - 5

I. ①随… II. ①张… III. ①杂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280907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随 缘 求 索 录

张绪山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 东 临 沂 新 华 印 刷 物 流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6888 - 5

2019年1月第1版

开本 889×1194 1/32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1¼

定价：68.00元



LEONIS S. OLSCHKE



光启文库

光启随笔 光启讲坛

光启学术 光启读本

光启通识 光启译丛

主 编：陈 恒 孙 逊

学术支持：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

责任编辑：王化文

装帧设计：纸想工作室

出版前言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前清学术，颇蒙其影响”。梁任公把以徐光启（1562—1633）为代表追求“西学”的学术思潮，看作中国近代思想的开端。自徐光启以降数代学人，立足中华文化，承续学术传统，致力中西交流，展开文明互鉴，在江南地区开创出海纳百川的新局面，也遥遥开启了上海作为近现代东西交流、学术出版的中心地位。有鉴于此，我们秉承徐光启的精神遗产，发扬其经世致用、开放交流的学术理念，创设“光启文库”。

文库分光启随笔、光启学术、光启通识、光启讲坛、光启读本、光启译丛等系列；努力构筑优秀学术人才集聚的高地、思想自由交流碰撞的平台，展示当代学术研究的成果，大力引介国外学术精品。如此，我们既可在自身文化中汲取养分，又能以高水准的海外成果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

文库推重“经世致用”，即注重文化的学术性和实用性，既促进学术价值的彰显，又推动现实关怀的呈现。文库以学术为第一要义，所选著作务求思想深刻、视角新颖、学养深厚；同时也注重实用，收录学术性与普及性皆佳、研究性与教学性兼顾、传承性与创新性俱备的优秀著作。以此，关注并回应重要时代议题与思想命题，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与国外学术的交流对话中，努力打造和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及话语体

系，为夯实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贡献绵薄之力。

文库推动“东西交流”，即注重文化的引入与输出，促进双向的碰撞与沟通，既借鉴西方文化，也传播中国声音，并希冀在交流中催生更绚烂的精神成果。文库着力收录西方古今智慧经典和学术前沿成果，推动其在国内的译介与出版；同时也致力收录汉语世界优秀专著，促进其影响力的提升，发挥更大的文化效用；此外，还将整理汇编海内外学者具有学术性、思想性的随笔、讲演、访谈等，建构思想操练和精神对话的空间。

我们深知，无论是推动文化的经世致用，还是促进思想的东西交流，本文库所能贡献的仅为涓埃之力。但若能成为一脉细流，汇入中华文化发展与复兴的时代潮流，便正是秉承光启精神，不负历史使命之职。

文库创建伊始，事务千头万绪，未来也任重道远。本文库涵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民俗等诸多人文学科，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通力合作。本文库综合著、译、编于一体，也需要多方助力协调。总之，文库的顺利推进绝非仅靠一己之力所能达成，实需相关机构、学者的鼎力襄助。谨此就教于大方之家，并致诚挚谢意。

清代学者阮元曾高度评价徐光启的贡献，“自利玛窦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近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追慕先贤，知往鉴今，希望通过“光启文库”的工作，搭建东西文化会通的坚实平台，矗起当代中国学术高原的瞩目高峰，以学术的方式阐释中国、理解世界，让阅读与思索弥漫于我们的精神家园。

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

2017年3月

自序

出家人常说“随缘”，意思是说凡事要顺其自然，不可强求。“随缘”二字，有时被人理解为“听天由命”，是行为消极。其实不然。一个人的一生可能有无数的“缘”，但最大的不可改变的根本之“缘”不外有三：一是时代，二是出身（家庭），三是个人的才情与阅历。这三种“缘”每个人都不相同，也不可能相同；纵使相似，亦不尽相同。

士之学问，多取决于其“缘”，以及随“缘”而来的“运”。“缘”既不同，“运”复有别，故千载之下，文章千差万别，多姿多彩，每不相同。有人崇新，有人嗜古；有人以博学争高，有人以专精竞胜；有人热衷于宏大叙事，长篇大论，有人潜心于精雕细刻，短小精悍；有人醉心于笔下风雷，惊涛拍岸，有人钟情于文辞婉约，清风徐来。林林总总，气象万千，所谓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是也。譬犹生活，有人豪情万丈，热衷于千里击水，战天斗地，甘之如饴；有人超凡脱俗，寄情于游山玩水，放浪形骸，优哉游哉；有人心如止水，凝神于晨钟暮鼓，枯坐静思，物我两忘。学问的乐趣，并无高下、文野之分；只要能使心灵得到安顿，便是值得称道、与生命有缘的学问。

这本集子所记录的，是一个习惯于躲在书斋里的读书人偶尔从

窗口探出头来，望一眼窗外的人间景致，然后缩回头来，静思默念间所得感悟的片断。这些片段乃随心随手而写，是个人生命机缘留下的痕迹，蕴含着个人的情趣与思考。屈原诗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故本书以“随缘求索录”为名。

2018年9月25日

目 录

自序	1
----	---

“科学”纵议

科学思维方式与历史研究的“假设”方法	3
西方人文精神传统与近代科学思维	13
任鸿隽“科学”理念的社会意义	23
论胡适的“科学方法”	32
如何理解基督教与科学的“敌对”关系	40
科学在中国的经历：从工具到信仰	47

史学杂咀

史鉴资治中的“对号入座”	69
论“以史为鉴”是否可能	75
拨开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	84
中国文明是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吗？	101
何为现代性	108

中国人的面子与面子观	116
中国传统思维中的“狗意识”	129
狗与政治	141

时说漫评

国学困境三题	153
“专制”何以成为问题名词	162
“苦难”不是文化创造的必要条件	167
“苦难催生文化论”是个假命题	172
“国家不幸诗家幸”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性	181
如何认识中国的皇权制度	187
“正心反腐论”是传统政治迷魂汤	200
论国人的“大师”情结	218
靖国神社问题反映的日本心态与逻辑	227
论惩罚的正义性	236

学林琐记

半个世纪以前的学术腐败	251
当今学术批评事业上的堂吉诃德	255
学者的个性与时代的特性	261
国人为何不忏悔？	268

无奈人生中勉力而为的成果	274
翻译事业的百年历程与现状	279
我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285
我与商务印书馆的缘分	289

萍踪遐思

阎锡山手令碑文中的民国景象	297
危难之际见“官”情	301
点点温情在心头	304
驻留心底的记忆	319
咖啡馆与希腊人的“会饮”传统	338
希腊魅力的诱惑	344
红薯中的百味人生	351
口中反腐记	359

“科学”纵议



科学思维方式与历史研究的“假设”方法

当今人们耳熟能详的“科学”概念指的是近代自然科学。它在本质上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自然科学各学科取得的具体成就，二是统御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思维方式，即理解和认识自然事物的法则。爱因斯坦说，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一是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二是文艺复兴时期证实的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的重要结论。¹可以说，逻辑原则和实验原则是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最基本的特点，对科学研究而言，这两个特点就像两翼对于飞鸟一样不可或缺。

严格意义上的近代自然科学形成于15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中叶的欧洲，后来传播到整个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科学在世界范

1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574页。

国内的盛行使科学思维方式获得空前的广泛性和一致性。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自觉地接受科学思维方式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近代科学在中华大地上确立其崇高威望和尊严开始的。1923年，胡适指出：“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¹科学的无上尊严使科学思维方式也得到了相应的尊严。

1920年，梁启超在其名作《清代学术概论》中称颂戴震的“科学精神”，并引申而论之曰：“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级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藉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实验之结果，寢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²他在这里突出地提到了“假定”方法论的问题。梁启超在总结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的研究成就时指出，王氏父子的“科学的研究法”是一“注意”（即注意观察）、二“虚己”（即不存先入为主之见，取客观资料做忠实研究）、三“立说”、四“搜证”（广集证据）、五“断案”、六“推论”。他解释“立说”一法，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立一假定之说以

1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6—37页。

为标准焉”，再次强调了科学研究中的“假定”方法。¹ 梁启超所论虽是清代人物学术，但其所谓“科学方法”为近代学术研究之通法，包括自然科学研究之法和人文学术研究之法。

科学研究中的“假定”方法的运用在当今已是常识性的共识。我国著名科学家吴大猷说：“科学的具体形式及实质部分，是各部门的知识，但科学包括获得这些知识的全部程序，如现象的观察和度量，由此形成或建立若干概念（基本的，及由此界定的观念），观察及度量结果的归纳和伸引，建立观念的函数关系（成为定律）；新观念的创立，实验的构想和计划，数学方法的采用和创造；以想象力创造理论（假设物理观念间的新函数关系），根据逻辑方法作演绎，推出新的函数关系，以实验测证这些关系以及其所由出之理论。”² 可见，在科学研究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假设”是不可缺少的研究方法。

在我国学术界，许多人文社会学科都被冠以“科学”的名号，历史学当然不能例外，于是便有“历史科学”的说法。然而，对于科学（即自然科学）研究中习以为常的“假设”方法可否用于历史研究，则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见解。譬如，近年来有人提出了所谓“假设历史”的问题，认为“假设”历史要不得，“假设”历史等于以子虚乌有的方式虚设历史，云云。对于这种见解，首先，我想指出的是，历史研究中，“假设”不可能是完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45—46页。

2 吴大猷：《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吴大猷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17—118页。